

陕西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

张懋镕 主编

青铜簠卷

胡嘉麟 著

科学出版社



陕西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张懋镕 主编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

青铜簠卷

胡嘉麟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审图号: GS (2018) 5945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 青铜簠卷 / 张懋谔主编; 胡嘉麟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8. 11

陕西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ISBN 978-7-03-055972-2

I. ①中… II. ①张… ②胡… III. ①青铜器 (考古) — 研究 — 中国
IV. ①K876.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312906号

责任编辑: 李 茜 曹 伟 / 责任校对: 邹慧卿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北京美光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年11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 × 1092 1/16

2018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40 插页: 1

字数: 942 000

定价: 3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编写缘起

经过十几年的准备工作，多卷本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即将出版。回顾往事，真是百感交集。

30年前，我的处女作《释“东”及与“东”有关之字》发表，从那时候起，青铜器的学习与研究注定成为我一生的追求。

29年前，我开始师从李学勤先生研习古文字。中国古文字有很多分支，如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简牍帛书文字。先生告诉我：“你在陕西，陕西有很多青铜器，你就做金文研究吧。”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这令我终身受益。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周原出土西周有铭青铜器综合研究》。所谓综合研究，就是从青铜器、古文字、历史文献三方面来研究。从此，综合研究成为我研究青铜器遵循的准则与方法。

1989年，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成立新的专业——博物馆专业，大概考虑到我本科学的是考古，于是把我从文献专业调到博物馆专业。我除了继续讲古文字，又开了一门新课“青铜器鉴定”。自此之后，我开始系统研习青铜器，包括没有铭文的青铜器。

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我渐渐对中国古代青铜器有了新的认识。

概而言之，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自两宋以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近百年来研究，在青铜器的分期、分区系、分国别、分器类诸方面卓有成效，为世人所瞩目。

回顾历史，也毋庸讳言，我认为就青铜器基础性工作而言，其资料的整理还远远不够。且提一个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问题：迄今为止究竟有多少件中国古代青铜容器？几万还是十几万（尚且没有涉及兵器、工具、车马器、钱币、铜镜等），恐怕连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都没有，专家也说不清楚。家底不清，研究对象模糊，研究很难继续深入。由于中国古代青铜器资料十分庞杂，其收集、整理并非易事，所以这一部分的工作非常重要。说到研究，比如青铜器的定名，鼎、鬲、簋等各类器物的分类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各类纹饰的分类研究，纹饰和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各个阶段铭文的特点，器物、纹饰、铭文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对断代的作用等，其研究或不够系统，或不够深入，有些方面甚至是空白。

20多年来，我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写了《西周方座簋研究》《两周青铜盨研究》《西周青铜器断代两系说刍议》《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试论青铜器自名现象的另类价值》等文章，希望从器类、断代、地域、定名等多个

角度和层面对青铜器进行探索。

同时我也十分关注国内外青铜器研究专家的成果，他们的论著是我案头的必备书籍，我经常阅读，受益无穷。

在研究中，我深感个人力量的有限。从1999年招收青铜器方向研究生起，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构想：如果研究生本人没有更好的研究题目，我就请他（她）来做青铜器中的某一部分，整理、研究某一类青铜器，或某一类纹饰，或某一时段的铭文，等等。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已经完成了20多篇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其中分器类的整理与研究完成多半，某一地区、某一时段的青铜器的整理与研究正在进行，纹饰与铭文的分类、分时段研究也做了一部分。这些为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的编撰奠定了基础。同时，我注意到其他先生也在指导研究生做类似的学位论文，对我们也很有启发与帮助。

前几年，在编写《青铜器论文索引》的过程中，我与线装书局的刘聪建先生多有接触。他听了我的上述介绍后，很感兴趣，遂与我商定，在原有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由我主编，各专题作者分别著述，形成一套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线装书局只出了三卷。如今，在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计划得以重新实现，拟在今后的若干年里，陆续完成和出版20卷以上的著作。

写作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的目的拟在全面、系统整理青铜器资料，充分吸取古今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组合关系等方面做全方位考察和研究，并试图总结出关于中国古代青铜器产生、发展、消亡的基本途径、规律、特点及其原因。这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但我们有信心一步一步地走近它。

由于这套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的作者都是毕业不久的研究生，眼界有限、文字青涩在所难免。我的指导也很有限，很多问题我也不懂或知之甚少。当时作学位论文时，我希望他们放胆子去写，因此他们的观点与我也不尽一致。但无论如何，在阅读他们的学位论文时，在与他们的反复讨论、交流中，我也有很多收获，这是最令人快乐的事情。我将阅读后的感想写出来，作为序言放在书前，就是希望继续与大家讨论，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整理与研究》延续下去。而随着一本本书稿的出版，这一批年轻的作者也正在走向成熟，这或许是比书稿的出版更有意义的事情。

最后，要感谢参加我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审阅论文的诸位先生，并希望今后继续得到你们的批评与帮助。感谢陕西师范大学暨历史文化学院给予的大力支持，感谢科学出版社李茜与曹伟两位编辑的辛勤工作，让我们十几年来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乙未年立冬后二日张懋镛写于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中心

15卷出版感言

迄今为止，《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已出版15卷。2015年出版第一批6卷，2016年出版第二批6卷，2018年出版第三批3卷。按照我们的计划这套书有30卷，如今已完成一半的工作，有必要做一个小结。

我们这套系列书编著的宗旨是：以青铜器的器类整理与研究为主，以区系、国别以及纹饰、铭文的整理与研究为辅，对中国古代（汉以前）的青铜礼容器进行初步的整理与研究，希望能为今后的青铜器研究做一点基础性工作。

与以往的系列书不同，这套书是在硕、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所有作者的专业方向和指导教师都是一致的。从硕、博士学位论文到书稿的出版，跨度最长的超过10年。若将硕、博士学位论文与书稿做一比较，就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换言之，从中可以窥见他们的成长历程。正如我在“编写缘起”中所期望的“随着一本本书稿的出版，这一批年轻的作者也正在走向成熟，这或许是比书稿的出版更有意义的事情”。

先谈谈我们编写这套书的有利条件。

第一，天时。大致40年来，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一直处在中国一个比较稳定的历史阶段。与诸多前辈学者相比，我们真的很幸运，不仅早已远离了战争的硝烟，也不用担心被打成“右派”，更不必考虑肚子能否填饱。单位的图书资料还算丰富，自己也可以用节省下来的钱购买一点必备的书籍。对于《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这样一套30卷本的系列书来说，从开始立意到最后完成，时间跨度很大，如果没有一个平稳安定的环境，早就夭折了。

第二，地利。我们的作者大都出生在陕西，学习、生活在陕西，这是一块富饶的热土，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说“地灵人杰”，想必有人会说我们自吹，但以自己的家乡为荣，则是人之常情了。作为“青铜器之乡”的陕西，几千年来青铜器层出不穷。每一次重要的发现，都让人热血沸腾。当青铜器还在墓里躺着的时候，我们就有幸下到坑底，早早目睹它们的真容。我们曾多少次与青铜器亲密接触，摩挲把玩……。此景此情，常让我们欲罢不能，不写点儿东西真就对不起祖先了。

第三，人和。要完成这样一套30卷的系列书，必须有一个关系紧密、人数足够的研究团队。好在我从1999年开始正式招收研究生，迄今为止已有40多名硕、博士生毕业。从书名可知，我们是整理与研究并重。整理的工作量非常大，譬如青铜簋就有3000来件，这也是以往这项工作迟迟没有人去做的重要原因，而研究生恰恰有充裕的

时间和充沛的精力来完成这项工作。

我和作者以及作者相互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不仅我不止一次地审读每一部书稿，也请其他作者帮忙审读，或者由作者自己请其他作者审读。有些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会在微信和QQ群里讨论，或者举办小型的讨论会来商议。

我不敢说我们的作者有多么聪明，但我可以说我们的作者是勤劳而朴实的。譬如任雪莉博士，她本是英语本科专业毕业，上了研究生才开始学习青铜器，而且她那时已经拖家带口，求学的西安与家所在的宝鸡有不近的距离，可以说条件比较差。然而她不仅完成了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还以此为基础，出版了《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戴家湾卷》和《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簠卷》两部书，博士学位论文外审获得全优，并荣获2016年陕西省优博论文称号。令人刮目相看的还有胡嘉麟博士。早先他在银川的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北方民族大学）历史专业读本科，那时他对考古还很陌生。十多年来，他刻苦钻研，阅读了大量书籍，并四处考察，积极参与相关学术活动，虚心向前辈学者学习，不仅完成了篇幅很大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簠卷》，还发表了不少论文。读到这些论文，我很欣慰，他正在褪去青涩，走向成熟。

我要感谢我的作者，为了这套书的完整性，他们有时要牺牲个人的一些利益。由于这套书的出版经费得到陕西师范大学的资助，书的封面写有“陕西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字样，不能冠以作者现在所在单位的名称，如此一来，成果有可能不被作者所在单位认可，进而影响到作者科研成果的计算和职称的评定，所以我要向他们致歉。

第四，得到多方面的帮助。首先在时间的支配和出版经费的资助方面得到陕西师范大学与历史文化学院两级领导的全力支持，并作为“陕西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立项。其次这14篇学位论文在答辩时，王辉、尹盛平、张天恩、曹玮、周晓陆、赵丛苍、王晖等专家提了不少宝贵意见，对提高论文水平帮助很大。在系列书陆续出版的过程中，王子今、王辉、朱凤瀚、刘绪、张天恩先生又先后写出书评，或褒奖或批评，都让我们受益匪浅。我们很清楚，自己的水平不够，愧对那些褒奖的语言，我们把专家的金玉良言看作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同时还要感谢作者所在单位领导和同人的支持与帮助。

再谈谈我们编写这套书的不利因素。

第一，包括主编在内，我们的作者大部分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没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那样的名校毕业生。就专业而言，其中只有6人是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本科毕业。我审读过多篇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博士学位论文，其视野之开阔、资料之熟谙、文笔之流畅，令人钦佩。就青铜器研究者需要具备的学术素养而言，我们自知差距不小。

第二，这15卷书中14卷是在硕、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其中只有《中国

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簋卷》和《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西周金文字体卷》的前身是博士学位论文，其他12卷均出自硕士学位论文。暂不论质量，就篇幅而言，这些硕士学位论文的字数多在3万~5万字，要把论文变成几十万字的书稿，无论对于作者还是主编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第三，15卷书的14位作者出书时的平均年龄是34.4岁。作为文科学生来说，这个年龄主要还是埋头读书的时候。即便是研究，也刚刚开始，能写几篇文章就不错了，要他们去完成这么一套系列书，确实有点勉为其难。记得我在西北大学上学的时候，我的好几位老师都说过这样的话：坐十年冷板凳，十年内不要写文章发表。这是真知灼见。只是后来形势不一样了，不发表文章、不写书，就难以生存。无奈之下，我一直把出书的目标定得比较低，他们只要能将资料笼络在一起，做一点初步的研究，就行了。我不能有或者说不敢有什么奢望，否则也许是拔苗助长，害了学生。

第四，水平参差不齐。譬如《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豆卷》的文笔比较好，而有些硕士学位论文本身就比较差。这些比较差的学位论文，原本也可以不转化为书稿出版，但是考虑到我们这套书的整体设计理念，除非作者不愿意出版，我还是尽可能尊重他们的意愿，将其书稿排入我们的出版计划。如此一来，要把这些学位论文都变成书稿，就更为艰难。鉴于这套书的编写原则，我们不可能请其他人来承担其中某一书稿或多部书稿的撰写工作。众所周知，近十多年来研究生扩招，导致总体水平下降，不少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还不如20世纪的大学本科生的学位论文。相信当过研究生导师的先生都有很深的感受。虽然这15本书稿经过多次修改校正，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正如诸位先生在书评中指出的那样。当然，主要责任还是在我。为此我一直是如履薄冰，惴惴不安。

有学者批评我们这套系列书观点不统一，主编和作者的看法也有所不同，从而让读者无所适从。批评是正确的。对此，我想做点说明，我们的情况确实比较特殊。我们这套系列书的编撰想法产生在多篇研究生学位论文已经形成之后，所以不利于对这些论文的观点做更改，除非作者自己愿意更改。从第一篇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伊始，我遵循的原则是学术自由，除非属于字词和概念错误，我必须要他（她）改正，否则任由作者发挥。当然，我会将自己的观点明确告诉我的学生。如果学生同意我的观点，我会和他（她）做进一步的讨论；如果学生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也不会干涉，但我会序言中表明我的态度。譬如关于戴家湾墓地的族属，关于罍、尊、甗的区分，我和作者的观点就不一样。记得我年轻时写过一些论文，请教我的导师李学勤先生，先生提了很多很好的意见，但那时的我年轻气盛，有些意见并没有采纳，至今回想起来还很后悔。人的学术成长是有一个过程的，难免犯错误，也许吃点教训印象更深刻，反而有好处。

总之，我们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进工作方法，继续编写出版这套系列书，同时也希望继续得到学界同行的批评指正，共同为繁荣学术而努力。

试论商周盛食器的兴衰（代序）

张懋镕

关于商周盛食器的兴衰，以往学者已经做了很好的研究^①。随着新资料的大量涌现，《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簋卷》^②《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豆卷》^③《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敦卷》^④《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簠卷》^⑤又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本文拟利用这些经过整理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勾勒商周时期主要青铜盛食器类的发展轨迹，并探讨其兴衰的原因。这对于研究夏、商、周三代其他青铜器的兴衰或许具有启示作用。

一、商周主要盛食器兴衰的基本态势

《青铜簋卷》《青铜豆卷》《青铜敦卷》《青铜簠卷》收集了大量关于这些器类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区域的数据资料，我们在此基础上列出两份统计表格，用具体数字

① 在这方面研究颇具特色的是陈芳妹先生，请参考她的论文：《商周青铜簋形器研究——附论簋与其它簠盛器的关系》，《商周青铜簠盛器特展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94年（第二版），29页；《簋与盂——簋与其他簠盛器的关系研究之一》，《故宫学术季刊》第1卷2期，1984年，89~110页；《盆、敦与簠——论春秋早、中期间青铜簠盛器的转变》，《故宫学术季刊》第2卷3期，1985年，63~118页。近年的研究可参考朱凤瀚先生的《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路国权博士的学位论文《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研究》（北京大学，2014年）的有关章节。

② 任雪莉：《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簋卷》（简称《青铜簋卷》），科学出版社，2016年。

③ 张翀：《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豆卷》（简称《青铜豆卷》），科学出版社，2015年。

④ 谷朝旭：《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敦卷》（简称《青铜敦卷》），科学出版社，2016年。

⑤ 胡嘉麟：《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簠卷》（简称《青铜簠卷》），科学出版社，2019年。本文以下所引此书的观点不再一一注明。

来呈现这些盛食器各自发展的基本态势，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①（表0-1、表0-2）。

表0-1 各阶段盛食器数量统计表（包括传世器）^②

器物 时代	簋	豆	簠	盥	敦	小计
商代	602	12				614
西周早期	858	2	3			863
西周中期	477	9	3	22		511
西周晚期	597	13	54	167		831
春秋早期	211	17	118	17		363
春秋中期	88	42	133	2	95	360
春秋晚期	17	93	151	2	123	386
战国早期	38	70	34		73	215
战国中期	15	28	21		107	171
战国晚期	5	20	13		18	56
总计	2908	306	530	210	416	4370

表0-2 各区域出土盛食器数量统计表

器物 地区	簋	豆	簠	盥	敦	小计
中原地区	349	121	198	25	131	824
关中地区	494	17	18	32	3	564
北方地区	49	36	9		21	115
海岱地区	77	56	51	8	64	256
长江中下游地区	150	22	127	1	143	443
巴蜀滇地区	1	6	1		20	28
总计	1120	258	404	66	382	2230

从表0-1、表0-2中可以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1）最早出现的盛食器是簋，然后是豆。商代的盛食器主要是簋与豆两类。在整个商代400年间，盛食器有614件，说明盛食器在商代尚处于起步阶段。西周早期不到

① 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青铜簋卷》《青铜豆卷》《青铜敦卷》《青铜簠卷》的成书和出版年份略有差异，引用资料的时间有所不同，所以近期请各位作者补充了一点新资料；至于青铜盥的数量，我们在十多年前做过统计，近期请孙晓鹏博士做了一些补充。由于各种原因，表中的数据会有一些误差，不过相信不会影响我们的结论。遗憾的是孟和盆的数量还没有统计出来，考虑到这两类器的数量不多，应该不会对研究产生较大的影响。以后将会弥补这点缺憾。

② 商周饪食器的总数是4370件，出土饪食器的数量是2230件，占总数的51.03%，换言之，有近乎一半的饪食器是传世器，因此我们在重视出土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传世器。

100年,然而盛食器数量突然升至863件,不仅大大超过商代,而且是盛食器数量最多的一个阶段,称得上盛食器发展史上的高峰期。到西周中期有所回落,降至511件。进入西周晚期,数量又一次攀上高峰,达到831件,与西周早期接近。鉴于从春秋早期开始盛食器数量持续走低,我们也可以将整个西周时期作为盛食器发展的高峰期。春秋早、中、晚三期盛食器的数量分别为363、360、386件,虽然数量远低于西周时期,但毕竟相互接近,可以说此时盛食器发展平稳。战国早、中、晚三期分别为215、171、56件,衰落的速度是很快的。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将中国古代青铜盛食器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初始期,商代早期至晚期;第二个阶段:繁荣期,西周早期至晚期;第三个阶段:平稳期,春秋早期至晚期;第四个阶段:衰落期,战国早期至晚期。

(2)从商代早期到战国末期的1300年间,青铜簋始终存在。数量有2908件,占主要盛食器总量的66.54%,即三分之二。即便在较为衰落的春秋中期,还有88件,几乎占到盛食器总量的四分之一,数量接近风头正盛的青铜敦。显然在商周盛食器中,簋是核心器物。

出土的青铜簋有1120件,占出土盛食器总量的50.22%,与前面所言全部簋占主要盛食器总量的66.54%要低一些,原因是传世簋中有铭文的簋更多一些,而有铭文的簋为历代鉴赏收藏者所偏好,更容易保存下来。所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簋都是盛食器的核心器物。

(3)在商代400年间里,青铜簋的数量是602件,还不抵区区西周早期青铜簋的数量。西周早期簋的数量突然升至858件,是数量最多的一个历史阶段,占到当时盛食器总量的99%以上,称得上青铜簋发展史上的高峰期。西周中、晚期的簋的数量分别为477、597件,分别占当时盛食器总量的93.35%和71.84%。整个西周时期簋的数量是1932件,占全部簋的66.43%,即三分之二。周人的“重食”观念由此得到确切的证明。

(4)中原地区出土的饪食器最多,其中豆、簋的数量名列第一,簋、盨、敦的数量名列第二,说明在商周时代中原地区始终处于首要地位。其次是关中地区,簋、盨的数量名列第一,则是得益于这里是西周王畿的所在地。

(5)西周中期簋的数量降至477件,比西周早期少了很多。按说鼎簋相配的制度是从西周中期开始的,簋的数量应该比较稳定,不至于如此锐减。任雪莉博士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昭王南征的失败导致铜原料的减少;二是此时开始流行的簠、盆等盛食器分担了簋的部分功能^①。这个解释是对的,但应该还有其他原因。昭王南征失败之后,铜路受阻的现象一直持续到晚期。另外西周晚期的簠有54件,是西周中期簠的18倍,盨的数量是167件,是中期盨的7.6倍,应该说西周晚期的盨和簠分担了簋更多的功

^① 任雪莉:《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簋卷》,科学出版社,2016年,269页。

能,为何到了西周晚期簋反而多起来,达到597件?难道是统计数据有误?

为了验证表0-1的数据,我们又根据吴镇烽先生的《商周》与《续编》^①,对有铭青铜簋的数量做了统计,列成表0-3。

表0-3 铭文簋数量统计表

时代 \ 器物	簋	百分比/%	铭文簋	百分比/%
商代	602	20.70	409	18.76
西周早期	858	29.50	706	32.39
西周中期	477	16.40	519	23.81
西周晚期	597	20.53	422	19.36
春秋早期	211	7.26	86	3.94
春秋中期	88	3.03	1	0.05
春秋晚期	17	0.58	22	1.01
战国早期	38	1.31	12	0.55
战国中期	15	0.52	2	0.09
战国晚期	5	0.17	1	0.05
总计	2908	100	2180	100

为了便于比较,左起第二栏列出各阶段青铜簋的数量,第四栏列出各阶段有铭青铜簋的数量。为了更直观一点,在第三与第五栏列出百分比。在商代,铭文簋与全体簋的比率差两个百分点,可见差别不大。到了西周早期,差率升至三个百分点。这种差别可以理解,因为有铭文的器物总是比较容易受到青睐,从而较多地保存了下来。但是到了西周中期,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差率超过七个百分点。耐人寻味的是,进入西周晚期,又回归了,差率在一个百分点左右。这无疑印证了表0-1的合理性,进一步说明在西周中期青铜簋的数量确实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我们注意到,在《青铜簋卷》的第七章“青铜簋器用制度研究”中,作者列出西周早期和中期出土青铜簋的墓葬数量分别为49座和8座^②,差别之大令人惊讶。我们不妨再举一个证据。《宝鸡强国墓地》附录一的第三小节是“青铜礼器组合与西周墓葬分期”^③,作者统计第二期即西周早期出土青铜礼器的墓葬有84座,其中出土青铜簋的墓葬有54座;第三期即西周中期偏早(穆共时期)出土青铜礼器的墓葬有25座,其中出土青铜簋的墓葬有21座;第四期即西周中期偏晚(懿、孝、夷王时期)出土青铜礼器的墓葬有3座,其中出土青铜簋的墓葬有2座;第五期即西周晚期(厉、宣、幽王时

①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本文简称《商周续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青铜簋的断代与《商周》和《续编》略有不同。

② 任雪莉:《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簋卷》,科学出版社,2016年,172~182页。

③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强国墓地》,文物出版社,1988年,492~529页。

期)出土青铜礼器的墓葬有9座,其中出土青铜簋的墓葬有1座。也就是说,西周中期总共只有28座出土青铜器的墓葬,比西周早期的84座少了56座,其中出土青铜簋的墓葬只有23座,比西周早期的54座少了31座。很明显,无论从出土青铜礼器的墓葬数量还是出土青铜簋的墓葬数量,从西周中期开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较之西周早期数量锐减。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各期簋的数量来分析问题,还要看到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西周中晚期实际上发现和发掘出土的青铜礼器的墓葬太少^①。按通常理,西周社会在向前发展,人口在增加,中晚期的墓葬应该超过早期。以此类推,西周中晚期的青铜簋的数量不但不应比早期少,还有可能超越早期。顺理成章的原因应该是西周中晚期尤其是西周中期发现的墓葬太少,被盗掘的墓葬太多,导致无法对墓葬出土青铜器组合关系有比较可靠的估算。如果我们的推论可以成立,那么就能证明西周早、中、晚三期的簋的数量都较多,青铜簋的衰落是从春秋早期开始的。

(6)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西周的各个时期,盛食器数量的变化大于青铜簋数量的变化。盛食器从早期的863件降至中期的511件,但到晚期又大幅度回升到831件。青铜簋从早期的858件降至中期的477件,晚期又升至597件。究其原因,与簋、盨以及豆的出现有关,这三类器的总数从西周中期的34件上升到西周晚期的234件,说明新的盛食器类确实起到了补充的作用。

(7)鉴于商代和东周王陵多有发现,而西周王陵至今不知所在,零星发现的西周王器如趺簋等也数量有限,因此实际上西周盛食器的数量远不止现今的统计数据,要比商代和东周多得多,显然以上我们对于西周盛食器地位的评价还不够充分,不会有丝毫夸大。

(8)如前所言,我们将春秋时期称之为平稳期,早、中、晚三个阶段的盛食器数量为363、360、386件。其中簋的数量是持续下降,但豆、簠、敦的数量是持续上升,从而保持了盛食器的相对平衡。如果说西周时期簋几乎是一枝独放,那么春秋时期则有点百花齐放的意思,这和当时政治态势的特点似乎有一种契合。

(9)盛食器的衰落主要表现在簋的衰落。簋开始衰落在春秋早期,从西周晚期的597件降至211件,减少386件,64.65%,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二。第二次锐减在春秋中期,从211件降至88件,减少123件,一半以上。虽然在春秋早期以后饪食器依赖豆、簠、敦维持相对平稳的局面,但昔日的辉煌毕竟不会再现。

(10)簠、盨、敦是簋的派生物(下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簋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代理者,或者称之为簋类器。在春秋时期,虽然簋的数量较少,但簠和敦的数量很可观。从这个角度来看,簋类器在春秋时期并没有衰落,真正的衰落在战国时期。

^① 朱凤瀚先生在《中国青铜器综论》里也谈到西周中期以后出土青铜器的墓葬较少。见氏著第1301、13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二、商周主要盛食器兴衰的途径

以上这些盛食器是怎样产生的呢？除了青铜簋和青铜豆直接来自陶簋和陶豆，青铜簋、盨、敦的产生都与青铜簋有密切关系。关于这一点，十几年前我们在《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①一文中已经做了初步论证，现将主要观点简述如下，并从器类兴衰的角度做一些新的解释。

如前所言，簋在西周早期步入兴盛时期，随之簋的派生物盨和盨相继出现，给盛食器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春秋早期之后簋不再是盛食器的主角，作为簋的继承者，青铜敦异军突起，与簋、豆相伯仲，成为春秋战国盛食器的主导者。这是两周盛食器的基本格局。

簋与簋、盨、敦的第一种关系是派生关系，这也是西周盛食器产生的主要途径之一。派生关系是指某种器类是在另一种器类的基础上衍生演化出来的。譬如盨、簋、敦，均由簋派生而来。

盨从簋派生出来，有直接的证明，盨的早期形态与簋很相似，而且早期盨在铭文中就自称是簋。盨的演化轨迹也和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盨在初现时并没有附足。而后出现缺口圈足盨，缺口将圈足分割成四块，就像四个粗大的足，相当于短足的附足簋。如厉宣时期的克盨（《商周》05678）、伯寯父盨（《商周》05636-38）。有一种型式的盨是圈足下设置四足，如晋侯对盨（《商周》05647-50）。还有一种型式的盨没有圈足，四足直接连在盨的外底，看起来像鼎，如召伯虎盨（《商周》05518）、矢賸盨（《商周》05514）。由于盨有时候代替簋与鼎形成新的组合，免不了在形制方面受到鼎的影响。总体而言，真正的圈足盨只占少数，主流型式是有缺口的圈足盨和附足盨，由圈足盨发展到缺口的圈足盨再到附足盨。附足盨晚于圈足簋，显然，盨在复制簋的演化模式。可以说盛食器中盨与簋最接近。西周中期的盨只有22件，西周晚期达到167件，而且主要出在中型及其以上的墓葬中，对簋起到一种补充作用。

最早的簋出现于西周早期，器口转角不是方折，而略呈圆角，形近于簋。金文中簋簋连称，也说明二者功能极为接近。与盨一样，青铜簋也是簋的派生物，所以巧得很，青铜簋的足部演化轨迹与青铜盨非常相似。进入西周晚期后，簋的圈足的中部开始出现长方形或果叶形缺口，与同时期盨的圈足缺口一样，如函交仲簋（《商周》05788）、虢叔簋（《商周》05813-14）。到了春秋战国，圈足的缺口越来越大，原先所谓的圈足，看起来与四足差不多。典型器物如蔡侯申簋（《商周》05775）、楚王禽肯簋（《商周》05842-44）。极端的做法如陈曼簋（《商周》05923-24），圈足

^① 张懋镕：《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133～141页。

缺口无限大,留下的部分已经与一般的器足没有什么区别了。还有一种型式的簠,器底下不接圈足,直接接四短足,如盟叔簠(《商周》05858)、京叔姬簠(《商周》05800)。可见,簠的演变规律和簠、盨很相似。

还有敦,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敦,其形态都与簠相仿。

最早出现的是平底敦,如洛阳中州路M2415:7敦,与簠很相似,以至于相互混淆,时间在春秋中期早段。相近的器物还有1976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息子行敦(《商周》06262)、河北唐县出土的归父敦(《商周》06066)。而后出现所谓盨式敦,在平底下伸出三小足。如楚王畬审盨(《商周》06056)、黄子婁盨(《商周续编》0523),以上两器年代均在春秋晚期,可见有足敦要晚于平底敦。至于标准的青铜敦即球形敦,与同时期鼎非常接近,俗称“西瓜鼎”,如昭之王孙即盨(《商周续编》0525)。有的下腹有三蹄足,足较长,如賁于嘏盨(《商周》06059),年代较晚,多数在春秋晚期偏晚和战国时期。在敦中,平底敦较少,多数是上述的盨式敦和球形敦。由此可见,敦的发展也与簠、簠、盨相似,是先有平底(或圈足),再向有足器过渡。

显然,青铜簠的演进模式对派生物盨、簠、敦等盛食器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派生关系有利于盛食器新器类的诞生,从而摆脱了对陶器模仿的依赖,在盛食器的演进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种关系是相生关系。相生关系是指两类不同的青铜器在发展演进过程中,由于组合关系,或者形态、用途、功能相近的缘故,相互吸引,从而产生一种在形制上介乎于二者之间的新品种。例如,鼎、簠之间有蹄足敦,鼎、盨之间有鼎形盨,孟、簠之间有孟形簠,簠、豆之间有簠形豆与豆形簠。敦类中有的近于簠,或做两簠相合状,有的近于鼎,或做两鼎相合状。相生关系产生了一批新类型,而造成盛食器面貌的多样化,大大丰富了盛食器的内容,对推动盛食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种关系是更替关系。更替关系是指两类青铜器在年代上有明显或不明显的早晚衔接关系,在形态、组合、用途、功能上有相似之处。例如,孟和盆,孟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中期之后就很少见了,而盆肇始于西周中期,流行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在形态上,西周中期的孟与盆有相似之处,如虢叔盆,形态是盆,但自名为孟。孟的功能有盛食器与水器两说,而盆也有相同的两说。孟与盆之间存在着一种更替关系。

以上三种关系有时会互相交错,同时存在于某一类铜器上。例如,铜敦,它是簠的派生物;当敦兴起之后,在很长时期内(春秋中期至战国),在相当广大的地区,取代了簠,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它与簠又形成一定程度上的更替关系。对被派生物如盨而言,往往流行时间短,流行地区有限,在墓葬青铜器组合中不是常见之物,但敦不同,因为它除了派生关系外,又多了相生与更替关系,产生了很多新型式,更能适应环境的变化,因此能在较长的时间和较广的区域内生存下来。再譬如簠,它也是簠

的派生物，在西周晚期，其数量不如簋的另一派生物——盨多，但春秋伊始，它逐渐超越铜盨，而在盨消失后，它不仅取代了盨，而且在范围不小的地区的墓葬铜器组合中取代了簋的地位，因此在这种意义上，它与簋又形成一定程度上的更替关系。这是铜簋较铜盨寿命更长一点的原因。

簋和盨不同于簋的一点是体量通常要大于簋，它们只出现在中级以上的贵族墓葬中，这无疑提升了簋类器在青铜礼器组合中的地位。

综上所述，派生关系催生新器类的诞生，相生关系催生新类型的出现，更替关系宣告旧器类的衰亡和新器类的产生。派生、相生、更替等关系使盛食器型式千变万化，非常丰富。正是这种变化，使盛食器在发展演进过程中更能适应礼制变化的要求，从而获得巨大的生命力。

需要补充的是，关于盛食器的更替关系，以前说得比较粗浅。就簋本身而言，数量庞大，型式多样，究竟是簋中的哪几个类型被取代？随着近年来研究的深入，我们可以谈得再具体一点。

如前所言，西周时期青铜簋数量多，型式丰富，西周早期出现的是方座簋、四耳簋、四足簋，中期以后更有圈三足簋、附耳簋、衔环耳簋、贯耳簋、豆形簋等。西周早期之后，很多型式的簋如四耳簋、四足簋、圈三足簋、衔环耳簋、贯耳簋、豆形簋等渐次消失或数量剧减，但是方座簋、附耳簋却留存了下来，一直到战国，而且保持着一定的数量和质量优势。可见青铜簋的兴衰也不能一概而论。

先说方座簋。据《青铜簋卷》统计，从西周早期方座簋出现，到战国晚期，共有202件，同时期全部簋的数量是2306件，即方座簋占8.76%^①。西周时期的方座簋有135件，同时期全部簋的数量是1932件，方座簋占6.99%。这两组数据说明方座簋在两周时期所占比例并不大。前面已经说到青铜簋自春秋早期开始走下坡路，依次推理，东周时期的方座簋所占比例应与西周时期相近或更小，但情况恰恰相反，春秋早期到战国晚期方座簋的数量是67件，而同时期全部簋的数量是374件，方座簋占17.91%，比先前翻了一倍多，说明在簋整体衰落的情况下，方座簋仍然保持一定的发展势头。

再谈附足簋。据《青铜簋卷》统计，从西周早期附足簋出现，到战国晚期，共有615件，同时期全部簋的数量是2306件，即附足簋占全部簋的26.67%。西周时期的附足簋有427件，同时期全部簋的数量是1932件，附足簋占22.1%。前面已经说到青铜簋自春秋早期开始走下坡路，依次推理，东周时期的附足簋所占比例应与西周时期相近或更小，但情况恰恰相反，春秋早期到战国晚期附足簋的数量是188件，而同时期全部簋的数量是374件，附足簋占50.27%，比先前翻了一倍多，说明在簋整体衰落的情况下，附足簋仍然保持较强的发展势头。

《青铜簋卷》将簋分为三大类：甲类圈足簋、乙类方座簋、丙类附足簋。如上所

① 任雪莉：《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簋卷》，科学出版社，2016年，144页。

言，乙类方座簋和丙类附足簋在簋走向衰落的时候还保持一定的发展态势，只有甲类圈足簋数量剧减、质量下降，从70.91%跌至31.82%。所以说，真正衰落的是甲类圈足簋。原因很清楚，只有甲类圈足簋与后起之秀的敦的形制最接近，被后者取代也就在情理之中。

在西周时期，簋无处不有，遍及大中小各个级别的墓葬中。进入春秋时期，情况发生变化，大夫级别以下的墓均不随葬簋。表面上看，似乎簋的地位上升了，但簋也因此失去了在更多中小型墓葬出现的可能，客观上造成行用层面的缩小，为衰落埋下伏笔。关于在春秋时期豆、簋如何取代簋的情况，我们在《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①一文中已经有所介绍。《青铜簋卷》则更详细地分析了簋是如何取代簋以及簋、豆、敦之间相互取代的关系。譬如谈到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青铜器组合时，指出在随葬簋、盃的情况下，簋不进入核心组合，鼎、簋、簋的组合等级和数量均高于鼎、盃、簋。详细情况请参考以上论著，本文不再赘言。

三、商周盛食器兴衰的原因

商周盛食器兴衰的原因很多，第一，主要是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大部分盛食器是礼容器，是礼制的物化。在现实社会中，这些盛食器是主人身份等级的标志，在主人去世后，墓中也要随葬这些器物。不同时代、不同身份等级的贵族生前和死后拥有器物的种类、型式、数量、质量是不同的，所以礼制的变化是导致盛食器变化的根本原因。关于这方面的文献记载主要是三礼。其中与周代的用器制度关系密切的是《仪礼·士丧礼》和《仪礼·既夕礼》。陈公柔先生在《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②一文中将随葬器物的种类和组合分为六个时段。《青铜簋卷》则依据奠仪从始死到下葬所出现的用器情况分为九个时段，总结出三点看法。其一，不同仪式环节所用器物的内涵不同。始死奠是死者日常生活器和专给死者使用的丧器，小敛奠是日常祭祀器，大敛奠是享神祭祀器，朝夕奠是日常生活器，朔月奠和荐新奠是馈食器，迁祖奠是祭祀器，祖奠有明器、用器、祭器、燕乐器、役器和燕器，大遣奠是祭祀器和明器。其二，文献所说“大遣奠加礼一等”只适用于大夫以上的级别，并且所加之礼并非明器。墓主人随葬哪套器物或哪几套器物，根据身份等级和实际情形需要具体分析。其三，以往认为明器是器型矮小、制作粗糙不能使用的器物，而实际上只要是为了“致送鬼神”在下葬前铸造的、未经使用的器物均可称为明器。《青铜簋卷》举了不少例子来说明。譬如谈到山西侯马晋侯墓地时，解释晋侯为什么用五鼎四簋，引

① 张懋谔：《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133～140页。

② 陈公柔：《士丧礼、既夕礼中所记载的丧葬制度》，《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